

论文

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

——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侯志阳*

【摘要】近年来，“收入－幸福”之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但学术界主要探讨工资、奖金等第一次收入分配与幸福感的关系，鲜有专门探讨社会保险这种第二次收入分配对幸福感的影响。论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 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能够显著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明显幸福，有医疗保险的也比没有医疗保险的更幸福；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中具有复杂的调节作用。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丰富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并且为中国政府完善社会保险、改善社会阶层结构、增强公共服务绩效，从而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社会保险 主观幸福感 阶层认同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8）06－0087－25

* 侯志阳，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社区资产建设研究”（18BSH044）、2017 年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一、引言

“收入－幸福”之谜一直困惑着学界。^①已有文献侧重研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公平四个变量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iener & Biswas－Diener，2002；Easterlin，2010；Okulicz－Kozaryn & Mazelis，2017）。^②这些研究中的收入指工资、奖金等显性收入，但社会保险作为一种间接收入，它与国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目前仍是谜，学术界鲜有文献涉及到这个问题。^③在探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少量文献中，奥拉·舍贝里（Ola Sjöberg）（Sjöberg，2010）认为失业保险通过降低公众的工作不安感，缓解害怕失业带来的压力、恐惧、焦虑，进而提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有学者通过全球42个国家的跨国比较分析，失业保险并不能显著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与身处失业保险欠发达的非福利国家的公众相比，在失业保险比较发达的福利国家中，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差别（Ouweneel，2002；Veenhoven，2000）。可见，与直接收入一样，作为间接收入的社会保险，也存在“社会保险－幸福”之谜，“社会保险－幸福”悖论也可能存在。

但现有文献主要以失业保险为研究对象，未能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与失业保险相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体系中覆盖面更广、发展时间更长的项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公众不同生命周期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更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其次，这些文献侧重研究发达国家社会保险与幸福感的关系，基于中国调查数据的同类研究还比较少见。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劳动力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的城乡、区域、职业不平等仍广泛存在，探讨这种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推进我们对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与幸福关系的理解。此外，有文献表明，

① 研究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已经积累很多，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其含义是，虽然横向比较发现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更感到幸福，但纵向来看个人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导致幸福感的相应提高（Easterlin，2010）。

② 主观幸福感，在英文文献中有 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Well－Being、Happiness、Life Satisfaction 等表述，中文译为主观幸福感、主观福利、心理福利，这些概念的基本意思并无本质差异（Jakubow，2016），在本文可交互使用。

③ 边燕杰和肖阳（2014）通过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后，推测社会保障可能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但他们没有做相应的实证研究加予验证。

阶层地位认同在经济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社会保险、房产、耐用消费品消费额四种不平等）与幸福之间起着重要作用（Zhao, 2012），但社会保险、阶层地位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还不甚清楚。最后，从现实层面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险建设、公共服务绩效改进和人们的获得感。截至2016年底，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82%，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5%（国务院，201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幅度提升。那么，这些保险覆盖面的扩大是否增加了国民幸福感？其中的解释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现有文献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本文围绕“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展开研究，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社会保险、主观幸福感、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四个关键词及其内在关系的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理论假设模型；第二部分交待文章的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分析策略；第三部分统计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假设；第四部分归纳文章的研究发现，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对社会福利最终结果的一种测量（Tao & Chiu, 2010）。但是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存在争议，两者关系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洪岩璧，2017）。积极功能论认为，社会保险作为进取型税收政策的一种工具，以再分配形式，弥补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让居民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普惠，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Oishi et al., 2012）。中国在1990年之前能达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当时失业率低以及覆盖面较广、项目齐备的社会保障网络有关（Easterlin et al., 2012）。在欧盟国家中，国家社会福利支出越高，公众主观幸福感也越高（Radcliff, 2001）。美国和12个欧盟国家的失业保障支出能够系统地提升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Tella et al., 2003）。加拿大社会保险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消费水平，减低相对贫困，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Baker et al., 2010）。

与此相反，消极功能论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典型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属于政府分配职能，如果社会保险覆盖面越广或水平越高，说明政府再分配能力越强，其财政汲取能力也越强。在给定的社会财富中，政府集中的财富越多，公共支出越大，居民的第一次收入占社会财富比例就越低，这可能会降低居民

幸福感 (Bjørnskov et al., 2007)。福利国家对失业者的失业保险支出、失业津贴不能显著提升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只有通过教育培训,让失业者获得工作,才能真正提升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Jakubow, 2016)。在西欧国家,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再分配,对公众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Hayo & Seifert, 2003)。

可见,社会保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仍有待检验。我们认为:养老保险保证参保者在年老时有稳定的生活经济来源,免除了参保者的后顾之忧;医疗保险保证参保者在生病时不会因病致贫返贫或因付不起医疗费陷入绝望,让参保者有所依靠,对美好生活有期待;因此,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险对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作用。由此,我们提出:

H1: 社会保险对公众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社会保险与阶层认同

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存在争议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时间周期论 (Easterlin et al., 2010)。这种观点认为,公众刚开始有了社保,会感到幸福,长期适应后,这种幸福效应可能会下降。二是拐点论 (闰丙金, 2012)。在社会保险覆盖面、水平到达一定拐点前,居民的幸福感和随着社保的完善逐步提升,但在一定拐点后,居民的幸福感和开始下降。这两种理论解释都没有将居民分阶层来看,很难细微考察社会保险与幸福之间的内在机理。不同阶层的居民对社会保险与幸福的感受可能存在差异,比如由于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家二次分配,随着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中上层居民可能感觉税负日益加大,幸福感反而下降;但下层居民可能觉得自己享受公共财政的好处越来越多,获得感明显增加,幸福感可能提升。因此,我们将从“阶层认同论”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社会保险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艾斯平·安德森 (Gosta Esping-Andersen) (Esping-Andersen, 1990) 认为,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各种服务或保障,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分层体系。韩克庆 (2008) 认为,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项目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决定中国未来社会不同的阶层结构。社会保险支出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占的比例越高,橄榄型阶层结构形成的可能性越大;社会救助支出的比例越高,金字塔型的阶层结构越有可能。宋宝安和李艳艳 (2009) 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应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固化在职业与群体中的经济资本,也是保证公民权力的一种政治资本,更是一种互助互济的文化资本。社会福利与阶层的产生隐含着密切的理论预设。功能论将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作为社会整

合的手段,满足社会底层的需要;冲突论将社会福利制度作为缓解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工具。

从社会福利的供给方式看:福利供给对象从只针对处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施舍到针对不同阶层居民的适度普惠;福利供给内容从单一的货币补助到货币、服务、培训等多元化的输出,以协助福利对象从社会底层流动到社会中上层。从社会福利的供给效果看,英国学者诺曼·巴里(Norman Barry)(2005:118)认为“社会福利的首要目标是再分配性质的:教育、保健、失业保险等物品的共同供给本身既是实现平等,又是减轻剥夺的一种机制”。

以上文献表明,社会福利制度从设立、运行到评估,其背后都蕴藏着社会分层因素,享受什么样福利的公民,往往也预示着其所处的阶层地位,比如领取社会救助的公民,说明他处于社会底层。此外,社会福利制度在析出底层群体的同时,也对受助者的人格尊严带来伤害。那些领取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处于社会底端。与领取社会救助不同,享受社会保险在中国代表一种身份。因为长期以来,只有城里人、体制内的人退休后才有养老金,去医院看病才能报销,老百姓尤其是农民认为拥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是一种“吃皇粮”现象,是地位较高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由此,我们提出:

H2: 社会保险对公众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享有社会保险的人认为自己的阶层地位较高。

(三) 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1. 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与客观阶层地位(比如职业地位)相比,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和个人的幸福感评价更密切(Han, 2014)。但是,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复杂多变的过程。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来看,个人的主观幸福感通常是个体在与别人的比较中建构的(Tideman et al., 2008)。那些自认为处于阶层地位较高的人 would 认为,他们掌握的资源比阶层地位低的人较多,幸福感水平也较高;而那些自认为处于低阶层地位的人则会在比较中因缺乏优势资源而痛苦。积极的阶层地位认同会增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在迅速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阶层地位竞争与焦虑加剧,这就传导到个人的幸福感评价上。主观阶层地位下降会产生很强的剥夺感,从而降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Zhao, 2012)。

由此,我们提出:

H3: 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越

高，幸福感水平越高。

2. 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阶层地位分化，这种分化又深刻影响公众的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Wilkinson & Pickett, 2009)。根据消费社会学理论，消费对于建构和维持阶层认同有着积极的影响 (王宁, 2001)。人们经常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阶层，从而将自己分类和社会定位。消费是人们维护或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社会保险作为集体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对公众阶层认同有着重要意义，它代表一种身份认同，有社保的人相比没有社保的人，优越感比较强，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也较高，主观幸福感也比较高。因此，我们提出：

H4：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的正向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社会保险会影响公众的阶层认同，进而通过阶层认同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

(四)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满意度的综合评价。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支出绩效越明显，公众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Ott, 2010; Ram, 2009)。马亮 (2013) 发现，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是影响公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多、质量优、价格低廉，并且顾及到不同阶层居民的需求，那么公民追求个人幸福的社会经济成本就低，个人幸福感也会提升。黄有光 (2003) 指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减少了居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最终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

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越大，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但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对不同收入阶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Kotakorpi & Laamanen, 2010)。研究表明，当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水平较高时，虽然身处较低阶层，他们也会感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感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生活便利，主观幸福感就会提升；而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居民由于工作压力大，长期享受特殊的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存在路径依赖，并且由于自身税负增加，转移支付给了中下层居民，对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反而不明显。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负向调节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较高程度的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下，阶层认

同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减弱。换言之即,相对而言,公众的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低的情况下,主观幸福感更易受到阶层认同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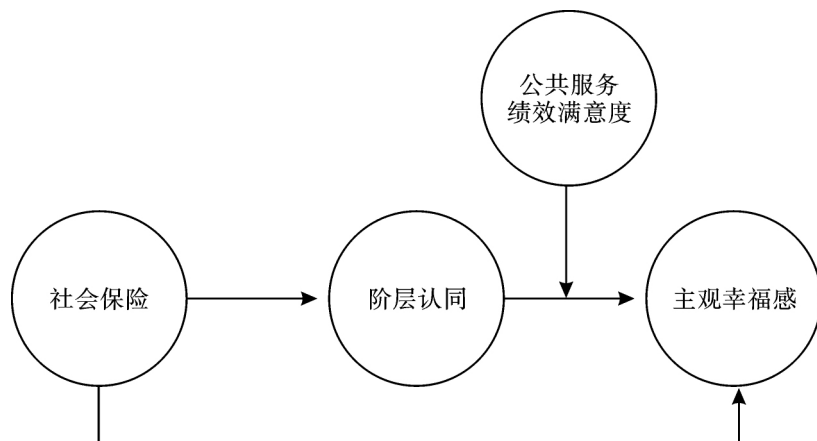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CGSS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这项调查主要是了解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2013年为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4次年度调查,也是CGSS自2003年开始以来的第10年。本次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其中:在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县区)和二级抽样单元(村委会和居委会),利

用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纸上作业；在村委会和居委会中抽取要调查的家庭时，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在家庭中调查个人时，利用 KISH 表进行实地抽样。调查对象界定为 18 周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采用入户面谈的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包括三个模块，第一模块涵盖受访对象的社会人口属性、健康、社会保障、迁移、生活方式、社会态度、阶层认同、政治参与行为和态度等内容；第二模块主要是针对社会态度、阶层认同进行十年回顾；第三模块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评价。经清洗和检验后，确认的有效样本为 10 724 个。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观评价，这种评价通常是个体将自己实际生活状态与理想生活状态比较后的一种肯定态度与积极感受（Diener, 2000）。幸福感具有积极性、主观性、综合性特征。杰德·布洛尔（Jed D. Blore）等（Blore et al., 2011）根据趋乐避苦的理论逻辑，挑战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性判断，从问题的反面入手，测量“去幸福感”，包括“痛苦”“困扰”“焦虑”等感受，为主观幸福感开辟了新的测量和分析视角。不管采用正向还是反向的询问方法，它们都属于自陈量表。研究表明，自陈量表法所产生的数据是富有研究价值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有效性与可比性（Easterlin, 2003；Krueger & Schkade, 2008）。

本文采用正向与负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测量幸福感，因为正向和负向的情感体验更能平衡地反映个体幸福感水平（Hansson et al., 2008）。对于正向体验，通过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度量，问卷中提供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级选项，^① 分别赋值 1-5 分；至于反向体验，则通过“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来度量，选项分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五个等级，分别赋值 1-5 分。然后，将这两个选项的得分累加求平均值，总分在 1-5 之间，分值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

第一，社会保险。测量社会保险通过“您是否参加以下社会保障项目？”来

^① 以往研究表明，这类问题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能很好地测量个体幸福（Veenhoven, 1991）。

询问,选项包括“是否参加城市或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两个,答案分为参加、没有参加、不适用,分别赋值1-3,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保险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我们剔除了“不适用”的样本,并将测量社会保险的两个变量处理为虚拟变量,1代表参加,0代表没有参加。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险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涉及人群最广、对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影响最深刻。随着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社会保障的建设与完善,截至2017年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54亿和11.76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在本次调查中:参加养老保险(城市或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占66.8%,没有参加的占31.3%,余下的1.9%为缺失值或不适用的;参加医疗保险(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占89.2%,没参加的占10.3%,余下的0.5%为缺失值或不适用。

第二,阶层认同。“阶层认同”(Strata Identification),也称“主观阶层认同”,是社会学的概念,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 1973: 570)。社会阶层是一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综合体现。测量社会阶层有客观法与主观法两种。运用CGSS数据做研究的部分国内学者,采用党员、收入或职业地位等客观指标来测量(闰丙金,2012)。我们认为,这些做法值得商榷。中共党员总共有8000万人左右,并非所有党员都掌握公共资源或权力,很难说党员的阶层地位比非党员高。采用收入来测量阶层地位虽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有问题。因为,很多人(尤其是政府官员或城市居民)会隐瞒或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此外,有研究表明,阶层认同不是由客观地位自动生成的,而是从人们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中日积月累产生的(汤普森,2001)。因此,本文采用主观测量法。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哪个等级?”(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为方便模型和回归系数的比较^①,我们将其处理为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表示社会阶层地位越高。本次调查平均分4.29,0.7%的人自认为处于社会顶层,7%的人自认为处于社会最底层,32.4%的人自认为处于5分的社会中

^① 由于随机误差项涉及未知方差项,常规的Logistic系列的回归模型在嵌套模型之间无法直接比较系数大小。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即计量经济学中的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参见理查德·布林(Richard Breen)和克里斯蒂安·卡尔森(Kristian B. Karlson)(Breen & Karlson, 2013)、胡安宁(2014)的研究。

间层。

第三，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公共服务绩效分为重视成本效益分析的客观测量模式和强调满意度等软指标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倪星、李佳源，2010）。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顾客至上和结果导向的理念占主导，公众主观评价模式备受重视和推崇。基于公众的主观评价模式（Citizen - Based Measure）有助于弥补单纯依赖客观产出指标无法评估政策影响的缺陷（England，1982）。

本文采用公共服务绩效的主观评价法。CGSS2013 中：测量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模块包括对教育、卫生、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的满意度评价；测量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题目有 4 项，即对高中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满意度评价，这 4 个项目的 Cronbach 信度系数为 0.812；测量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题目有 10 项，即对基本药物制度、药品安全管理、卫生监督协管、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慢性病管理、城乡居民健康档案服务、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服务以及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保健等的满意度评价，这 10 个项目的 Cronbach 信度系数为 0.895；测量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题目有 7 项，即对经济与社会组织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互联网服务管理、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化解、食品药品安全、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等满意度评价，这 7 个项目的 Cronbach 信度系数为 0.788。为更好地了解公众的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情况，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测量教育、卫生、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旋转：测量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 4 个题目可提取 1 个因子，我们将其命名为“公共教育服务因子”；测量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 10 个题目可提取 2 个因子，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公共卫生管理因子”和“公共卫生服务因子”；测量社会管理与服务 7 个题目可提取 2 个因子，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社会管理因子”和“社会安全服务因子”（详见表 1）。

表 1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因子分析与信度

因子	满意度测量项目	因子 负荷值	共量	特征值	解释方 差（%）
公共教育服务 Cronbach $\alpha = 0.812$	1. 高中教育	.850	.587	2.562	64.062
	2. 九年义务教育	.808	.653		
	3. 职业教育	.775	.722		
	4. 学前教育	.766	.601		

(续上表)

因子	满意度测量项目	因子 负荷值	共量	特征值	解释方 差 (%)
公共卫生管理	5. 基本药物制度	.846	.508	3.457	34.565
	6. 药品安全管理	.818	.581		
	7. 卫生监督协管(食品、饮水等)	.768	.648		
	8.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693	.670		
	9. 慢性病管理	.612	.597		
	10. 城乡居民健康档案服务	.509	.607		
公共卫生服务	11. 预防接种	.801	.616	2.848	28.484
	12. 传染病防治	.781	.640		
	13. 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保健	.722	.745		
	14. 健康教育服务	.595	.693		
Cronbach $\alpha = 0.895$					
总特征值				6.305	
总解释方差					63.049
社会管理	15. 经济与社会组织管理	.896	.382	2.284	32.624
	16. 维护市场秩序	.855	.479		
	17. 互联网服务管理	.752	.704		
社会安全服务	18. 社会治安	.838	.656	2.129	30.415
	19. 社会矛盾化解	.780	.591		
	20. 食品药品安全	.676	.823		
	21. 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	.519	.777		
Cronbach $\alpha = 0.788$					
总特征值				4.413	
总解释方差					63.039

注 “Cronbach α ” 为内部一致性系数。所有测量项目的答案采用五分李克特量表, “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中立”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分别赋值 1-5。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3. 控制变量

从已有的研究看, 下列因素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为获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净效应, 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1) 性别: 男 = 1, 女 = 0。(2) 年龄: 问卷中受访者的年龄以 “出生年” 标示, 本文采用 2013 减去受访者出生年的方法进行转换, 将其处理为连续变量。(3) 婚姻状况: 问卷中 “从未结

◆ 论文

过婚 = 1, 同居 = 2, 初婚有配偶 = 3, 再婚有配偶 = 4, 分居未离婚 = 5, 离婚 = 6, 丧偶 = 7”。我们将其转化为未婚 (含前 2 项) 和已婚 (含后 5 项) 两大类, 已婚 = 1, 未婚 = 0。(4) 户籍: 问卷中 “农业户口 = 1, 非农业户口 = 2, 蓝印户口 = 3, 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口) = 4, 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 5, 军籍 = 6, 没有户口 = 7, 其他 = 8”。我们将其转化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农业户口 = 1, 非农业户口 = 0。(5) 受教育状况: 问卷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 1 - 13, 我们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小学及小学以下 = 6, 初中 = 9, 高中、中专或技校 = 12, 大学专科 = 15, 大学本科 = 16, 研究生及以上 = 19, 视为连续变量。(6) 收入: 问卷中的题目是 “您个人去年全年 (2012) 的总收入是多少?”,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回归系数, 我们取收入的对数进入回归模型。(7) 政治面貌: 问卷中中共党员 = 1, 民主党派 = 2, 共青团员 = 3, 群众 = 4, 我们将其转化为是否中共党员两大类, 中共党员 = 1, 非中共党员 = 0。(8) 身体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 1, 比较不健康 = 2, 一般 = 3, 比较健康 = 4, 很健康 = 5。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得分		3.82	.77	1	5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非常不幸福 = 1、比较不幸福 = 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3、比较幸福 = 4、非常幸福 = 5	3.72	.96	1	5
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总是 = 1、经常 = 2、有时 = 3、很少 = 4、从不 = 5	3.92	.99	1	5
解释变量					
社会保险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是 = 1	.68	.47	0	1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是 = 1	.89 [*]	.31	0	1
阶层认同	最底层 = 1、最顶层 = 10	4.29	1.73	1	10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					
公共教育服务因子	非常不满意 = 1	0	1	-7.97	2.06
公共卫生管理因子	比较不满意 = 2	0	1	-6.55	2.27
公共卫生服务因子	中立 = 3	0	1	-7.67	2.99
社会管理因子	比较满意 = 4	0	1	-5.95	1.83
社会安全服务因子	非常满意 = 5	0	1	-7.81	3.44

(续上表)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	0.5	0.5	0	1
年龄		48.84	25.09	17	97
婚姻	已婚 = 1	0.89	0.3	0	1
户籍	农业户口 = 1	0.55	0.49	0	1
受教育年限		9.58	3.45	6	19
收入对数		10.36	2.36	4.38	16.1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1	0.1	0.3	0	1
身体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比较健康 = 4、很健康 = 5	3.83	0.3	1	5

注:^{*} 因为是大样本,没参加医保的仍有 1 000 多个样本,该变量仍然有一定的解释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分析策略

本文主要采用 SPSS22.0 相关的统计分析。首先,采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其次,运用回归分析考察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和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采用层级回归检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 相关性分析

表 3 所示的是本文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幸福感相关系数分别是 0.38 和 0.33,在 0.01 水平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社会保险与阶层认同也具有正相关关系,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阶层认同相关系数分别是 0.049 和 0.033,在 0.01 水平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而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r = 0.254$, $P < 0.01$)。由此可

见,相关性分析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3。此外,表 3 还发现,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 5 个因子与阶层认同、主观幸福感也有很强的相关性,显著水平都在 0.01 以下。为获得更深入稳健的实证论据,我们需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这些变量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 是否参加 养老保险	1	.325**	.38**	.049**	.043**	-.010	.080**	-.007	.029**
2. 是否参加 医疗保险	.325**	1	.33**	.033**	.030**	-.005	.042**	-.003	.050**
3. 幸福感 得分	.38**	.33**	1	.254**	.107**	.067**	.143**	.089**	.073**
4. 阶层认同	.049**	.033**	.254**	1	.045**	.051**	.104**	.106**	.047**
5. 公共教育 服务因子	.043**	.030*	.107**	.045**	1	.228**	.249**	.206**	.294**
6. 公共卫生 管理因子	-.010	-.005	.067**	.051**	.228**	1	.000	.440**	.264**
7. 公共卫生 服务因子	.080**	.042**	.143**	.104**	.249**	.000	1	.248**	.228**
8. 社会管理 因子	-.007	-.003	.089**	.106**	.206**	.440**	.248**	1	.000
9. 社会安全 服务因子	.029*	.050**	.073**	.047**	.294**	.264**	.228**	.000	1
有效样本量 (N)	10 519	10 670	10 724	10 724	5 411	5 411	5 411	5 411	5 411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双尾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借鉴鲁本·巴伦 (Reuben M. Baron) 和大卫·肯尼 (David A. Kenny) (Baron & Kenny, 1986) 关于中介变量的四步骤检验法,这个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许多学者都模仿此法检验中介变量效应 (Nowell et al., 2016)。具体而言:(1) 检验社会保险对阶层认同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H2); (2) 检验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H3); (3) 检验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是

否具有显著影响 (H1); (4) 如果这三个关系成立, 再检验社会保险、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H4)。此时, 如果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著, 那么说明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阶层认同传递的, 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成立 (详见表 4)。

表 4 的模型 1 显示, 除了年龄, 其他控制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 身体健康状况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最大 ($Beta = 0.15$), 身体越健康, 阶层认同地位越高; 受教育年限、收入对数对阶层认同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受教育年限越长, 阶层认同地位越高, 收入越高, 阶层认同地位越高; 已婚的阶层认同地位比未婚的要高; 非农业户口的阶层认同地位比农业户口的要高; 中共党员的阶层认同地位比非中共党员的要高; 除此之外, 有意思的是, 男性的阶层认同地位比女性的低, 这是否与男性的压力较大相关, 有待于今后验证。模型 2 显示社会保险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对阶层认同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达到 0.026 ($P < 0.05$)、0.029 ($P < 0.0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 社会保险可以解释阶层认同 7.7% 的方差, 该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2。模型 3 的回归结果表明, 除了受教育年限, 其他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意义。与模型 1 不同的是: 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变得显著了, 年龄越大, 主观幸福感越高;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反向作用, 收入越高, 主观幸福感反而越低。与模型 1 一样, 女性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高, 已婚的比未婚的主观幸福感高, 非农业户口比农业户口的的主观幸福感高, 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的主观幸福感高, 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仍然最大 ($Beta = 0.489$), 且有正向效应, 身体越健康, 主观幸福感越高。而模型 4 的结果显示, 在考虑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参加养老保险的比未参加的主观幸福感得分高出 0.21 ($P < 0.05$), 参加医疗保险的比未参加的主观幸福感得分高出 0.29 ($P < 0.001$), 模型解释力达到了 25.7%。因此, 本文的研究假设 H1 得到了证实。模型 5 表明, 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 = 0.167, P < 0.001$), 模型解释力达到 26.1%。所以, 研究假设 H3 成立。最后, 我们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险、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正如模型 6 所示, 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Beta = 0.165, P < 0.001$), 但是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减弱了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 $Beta =$ 从 0.21 降到 0.17;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的 $Beta =$ 从 0.29 降到 0.25), 这说明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阶层认同传递的。根据巴伦和肯尼 (Baron & Kenny, 1986) 的中介作用检验法, 本研究表明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即假设 H4 得到了部分证实。

表 4 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类型	阶层认同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1. 控制变量						
性别 ^a	-.051 ^{****}	-.051 ^{****}	-.015 [*]	-.015 [*]	-.006	-.007
年龄	-.018	-.022 ^{**}	.046 ^{****}	.042 ^{****}	.049 ^{****}	.046 ^{****}
婚姻 ^b	.063 ^{****}	.056 ^{****}	.036 ^{****}	.030 ^{****}	.026 ^{****}	.021 ^{**}
户籍 ^c	-.061 ^{****}	-.060 ^{****}	-.031 ^{****}	-.030 ^{****}	-.020 ^{****}	-.020 ^{****}
受教育年限	.113 ^{****}	.110 ^{****}	.006	.003	-.013	-.016
收入对数	.061 ^{****}	.064 ^{****}	-.015 [*]	-.012	-.026 ^{****}	-.023 ^{****}
政治面貌 ^d	.062 ^{****}	.060 ^{****}	.051 ^{****}	.049 ^{****}	.041 ^{****}	.039 ^{****}
身体健康状况	.150 ^{****}	.150 ^{****}	.489 ^{****}	.489 ^{****}	.464 ^{****}	.465 ^{****}
2. 自变量社会保险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26 ^{**}		.21 ^{**}		.17 ^{**}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29 ^{****}		.29 ^{****}		.25 ^{****}
3. 中介变量						
阶层认同					.167 ^{****}	.165 ^{****}
观测值	9377	9377	9377	9377	9377	9377
ΔR^2	7.5%	7.7%	23.6%	25.7%	26.1%	28.2%
F 值	109.886 ^{****}	90.274 ^{****}	414.16 ^{****}	334.24 ^{****}	422.330 ^{****}	347.427 ^{****}

注：****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双尾检验。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a、b、c、d 的参照变量分别为男性 = 1、已婚 = 1、农业户口 = 1、中共党员 = 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文假设 H5 提出,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即高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会削弱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而低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则强化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该假设, 我们采用调节回归分析的三步骤检验法 (Nowell et al., 2016), 并采用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即如果加入交互项的时候, ΔR^2 是显著的, 那么该调节作用存在。具体而言, 三步骤检验法为: 首先, 检验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其次, 考察阶层认同与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二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共同作用; 最后, 将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及两者的交互项^①加入方程, 检验这些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果第三个步骤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并且显著, 那么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正向调节作用成立。实证检验结果参见表 5。

我们通过表 5 中的模型 1 可以看出, 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阶层认同水平增加一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得分就上扬 0.167 分。同时, 对表 5 的模型 2 结果显示, 阶层认同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诸因子 (除了社会管理因子) 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阶层认同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161 ($P < 0.001$),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因子共 4 个, 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公共教育服务因子 $Beta = 0.042$ ($P < 0.001$)、公共卫生管理因子 $Beta = 0.019$ ($P < 0.05$)、公共卫生服务因子 $Beta = 0.041$ ($P < 0.001$)、社会安全服务因子 $Beta = 0.024$ ($P < 0.01$)。为了检验假设 H5, 本文进一步在表 5 的模型 3 中加入阶层认同与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中的 5 个因子中, 只有公共教育服务因子、社会安全服务因子与阶层认同的交互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它们的 $Beta$ 分别是 -0.038 ($P < 0.05$) 和 0.037 ($P < 0.05$), 模型解释力也达到了 26.7% ($P < 0.001$)。根据上述的判断方法,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即本文的研究假设 H5 得到了部分验证。但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是复杂的, 其中公共教育服务因子起着反向调节作用, 当居民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满意度越高时, 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削弱,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公共服务均

① 在引入交互项之间, 我们分别对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作变量中心化处理。

等化,中下层居民也能享受适度普惠的教育福利,不同阶层之间因教育公共服务不均等引起的幸福感差别就弱化了,这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但是,与我们设想相左的是,社会安全服务因子扮演正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当居民的社会安全服务满意度分数越高,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明显增强。这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阶层地位越高的人居住的社区治安就比较好,使用的食品药品也比较安全,利益表达的渠道也比较多,因此,社会安全服务因子强化了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公共卫生管理因子、公共卫生服务因子和社会管理因子与阶层认同的交互项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5 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类型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1. 控制变量	性别 ^a	-.006	-.007	-.007
	年龄	.049 ****	.047 ****	.047 ****
	婚姻 ^b	.026 ****	.024 ***	.024 ***
	户籍 ^c	-.020 **	-.022 **	-.022 **
	受教育年限	-.013	-.007	-.008
	收入对数	-.026 ***	-.022 **	-.022 ***
	政治面貌 ^d	.041 ****	.040 ****	.039 ****
	身体健康状况	.464 ****	.460 ****	.460 ****
2. 自变量	阶层认同	.167 ****	.161 ****	.162 ****
3. 调节变量	公共教育服务因子		.042 ****	.078 ****
	公共卫生管理因子		.019 **	.042 *
公共服务绩效 满意度	公共卫生服务因子		.041 ****	.038 *
	社会管理因子		-.009	-.023
	社会安全服务因子		.024 ***	-.009
4. 交互项	阶层认同 × 公共教育服务因子			-.038 **
	阶层认同 × 公共卫生管理因子			-.026
	阶层认同 × 公共卫生服务因子			.002
	阶层认同 × 社会管理因子			.015
	阶层认同 × 社会安全服务因子			.037 **
观测值		4 740	4 740	4 740

(续上表)

变量类型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ΔR^2	26.1%	26.7%	26.7%
F 值	422.330 ****	280.517 ****	207.038 ****

注: ****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双尾检验。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a、b、c、d 的参照变量分别为男性 = 1、已婚 = 1、农业户口 = 1、中共党员 =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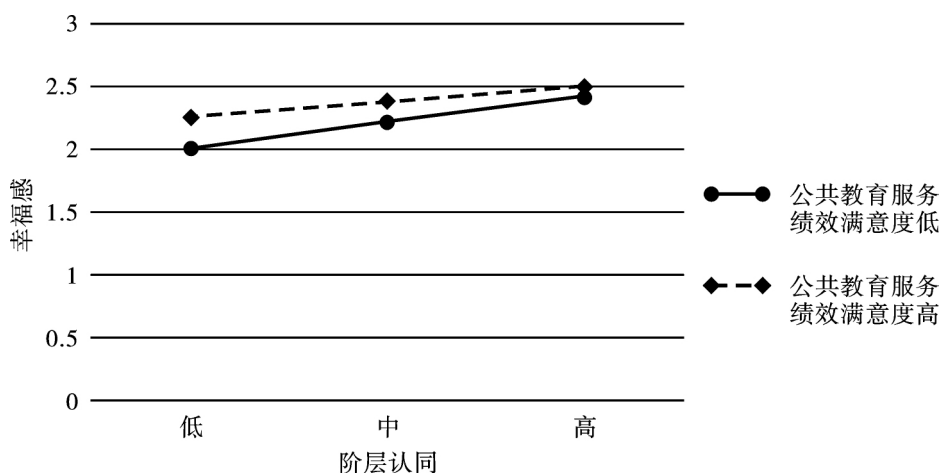


图2 公共教育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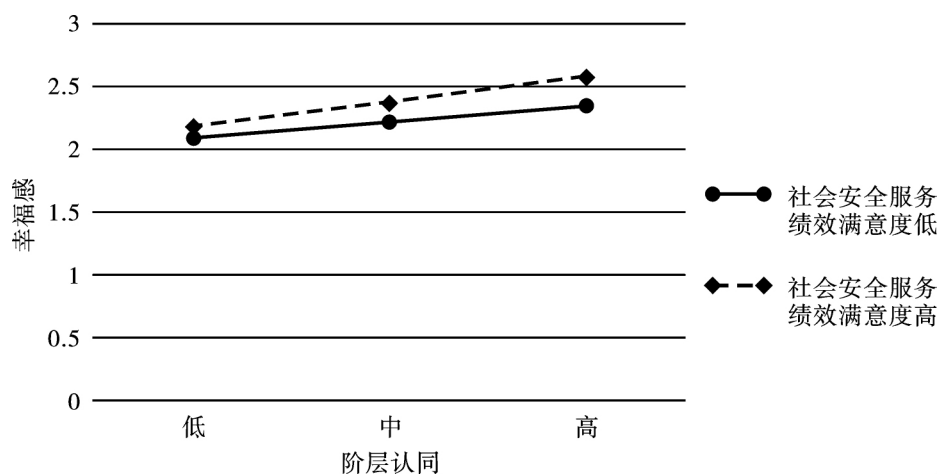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安全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二者关系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角色,我们借鉴艾肯(Leona S. Aiken)和韦斯特(Stephen G. West)(Aiken & West, 1991)关于交互作用的解释方法,绘制了图2、图3。如图2所示,当公众对公共教育服务绩效满意度较高时,阶层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图3表明,当公众对社会安全服务绩效满意度较高时,阶层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也逐渐增强。

五、结论与讨论

(一) 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社会保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即“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本研究利用CGSS2013的数据,专门检验了社会保险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阶层认同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确实能让我们更幸福,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明显幸福,有医疗保险的也比没有医疗保险的更幸福。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部分是经由阶层认同传导的。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公众对社会安全服务的满意度提升时,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明显增强;但是,当公众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满意度越高时,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削弱。在所选的控制变量中,“身体健康状况”对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越好的公众越幸福;年龄越大的人主观幸福感越高;女性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高;已婚比未婚更幸福;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比农业户口的更幸福;中共党员的居民比非中共党员的更幸福;但是,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反而越低。

(二) 研究价值

本研究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第一,本文首次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大样本的调查数据,检验了社会保险、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尝试揭开“社会保险-幸福”之谜,推进了“收入-幸福”之谜的知识增长。以前的研究主要以工资、奖金等直接收入作为解释变量(Easterlin, 2001; Okulicz-Kozaryn & Mazelis, 2017; 李路路、石磊,

2017),鲜有专门研究社会保险这种间接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二,本文以中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作为研究对象,也推进了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险与幸福关系的探讨。以前的文献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失业保险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Sjöberg, 2010)。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社会保险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功能论,拥有社会保险的公众比没有社会保险的公众更幸福。同时,本研究发现阶层认同在社会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为政府部门加强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调整社会阶层结构,从而提高国民幸福感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本文检验了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丰富了阶层认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同时,再次凸显了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重要性,这为相关政府部门改进公共服务绩效,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数据支撑。

本研究对中国政府提升国民幸福感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积极完善社会保险、调整社会分层结构、改进公共服务绩效,从而提升国民幸福感。从控制变量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看,要提升国民幸福感,国民健康水平很重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要提升国民幸福感,应重点提升中青年、男性居民、未婚居民、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等群体的幸福感;同时,也要关怀中高收入群体的幸福生活。从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看,政府一定要尽快促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在深入分析城乡居民未参保或退保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有效措施引导他们参保。第二,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阶层认同传导的,因此要通过社会保险政策形塑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提升国民幸福感。第三,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在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调节作用,因此要积极提升公众对社会安全服务和教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社会安全服务方面,要努力改善社会治安、化解社会矛盾、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做好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等。教育公共服务方面,高中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要尽量让多数人满意,因为这可以弱化阶层不平等带来的幸福感差异。

(三) 研究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这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启示。首先,受限于CGSS问卷题目,社会保险测量指标只包含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今后可增加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项目,指标上可增加“参与社会保险种类的数量”“参与社会保险时间”“享受社会保险水平”等。其次,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只代表中国城乡居民某一时点的状态,未来研

◆ 论文

究可运用实验研究或纵贯研究的方法验证社会保险、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①最后,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中国,今后可尝试跨国比较方法,检验“社会保险越发达的国家,国民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命题是否成立。

参考文献

- 边燕杰、肖阳(2014). 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2: 22-42.
- E. P. 汤普森(2001).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国务院(2017).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9号).
- 韩克庆(2008). 社会安全网: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福利建设. 社会科学研究, 5: 115-118.
- 洪岩璧(2017).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社会, 2: 106-132.
- 胡安宁(2014). 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5: 116-130.
- 黄有光(2003).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路路、石磊(2017).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社会学研究, 3: 95-120.
- 马亮(2013). 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 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2: 104-109.
- 倪星、李佳源(2010). 政府绩效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 有效抑或无效? ——关于公众主观评价效度争议的述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 108-116.
- 诺曼·巴里(2005). 福利. 储建国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闰丙金(2012).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统计研究, 10: 64-72.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 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1805/t20180521_294287.html. 2018年12月10日访问.
- 宋宝安、李艳艳(2009). 论社会分层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 社会保障研究, 1: 35-42.
- 王宁(2001). 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 1: 6-16.
-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① CGSS历次调查的对象不同,测量社会保险、阶层认同、主观幸福感的题目略有不同,但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测量题目差距较大,因此,不适合做时间序列分析。本文尝试用混合横截面方法分析,其结果与本文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 Newbury Park, CA: Sage Press.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1(6):11 – 73.
- Baker, M., Gruber, J. & Milligan, K. (2010). The Retirement Incentive Effects of Canada's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6(2):261 – 290.
- Björnskov, C., Dreher, A. & Fischer, J. A. V. (2007). 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 *Public Choice*, 130(3 – 4):267 – 292.
- Blore, J. D., Stokes, M. A., Mellor, D., Firth, L. & Cummins, R. A. (2011). Comparing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to Affective Models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1):1 – 16.
- Breen, R. & Karlson, K. B. (2013). Counterfactual Causal Analysis and Non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In Morgan, S. T. Ed. *Handbook of Caus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34 – 43.
- Diener, E. & Biswas – Diener, R.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2):119 – 169.
- Easterlin, R. A.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19):11176 – 11183.
- Easterlin, R. A. (2010).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n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11(473):465 – 484.
- Easterlin, R. A., Mcvey, L. A., Switek, M., Sawangfa, O. & Zweig, J. S. (2010). The Happiness – 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52):22463 – 22468.
- England, B. R. E. (1982). Urban Policy Making and Subjective Service Evaluations: Are They Compatibl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2(2):127 – 135.
- Esping – 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nsson, A., Forsell, Y., Hochwälder, J. & Hillerås, P. (2008). Impact of Changes in Life Circumstances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n Adult, Population over a 3 – Year Period. *Public Health*, 122(12):1392 – 1398.
- Han, C. (2014). Health Implications of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9(2):495 – 514.
- Hayo, B. & Seifert, W. (2003). Subjective Economic Well – Being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 论文

- Economic Psychology*, 24(3): 329 – 348.
- Jakubow, A. (2016)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The Welfare State: Giving A Fish or Teaching to Fis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8(3): 1147 – 1169.
- Jackman, M. R. & Jackman, R. W. (1973)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5): 569 – 582.
- Kotakorpi, K. & Laamanen, J. P. (2010) . Welfare Stat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 *Economica*, 77(307): 565 – 583.
- Krueger, A. B. & Schkade, D. A. (2010) . The Reliability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Measures. *Warwick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92(8): 1833 – 1845.
- Nowell, B. , Izod, A. M. , Ngaruiya, K. M. & Boyd, N. M. (2016) .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Comparing Two Motivational Constructs in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withi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6(4): 633 – 676.
- Oishi, S. , Schimmack, U. & Diener, E. (2012) .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Nations. *Psychol Sci*, 23(1): 86 – 92.
- Okulicz – Kozaryn, A. & Mazelis, J. M. (2017) . More Unequal in Income, More Unequal in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2(3): 953 – 975.
- Ott, J. (2010) . Greater Happiness for A Greater Number: Some Non – Controversial Options fo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5): 631 – 647.
- Ouweneel, P. (2002)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l – Being of The Unemployed in 42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2): 167 – 192.
- Radcliff, B. (2001) . Politics, Mark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Happi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 939 – 952.
- Ram, R. (2009) .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 – Country Samples. *Public Choice*, 138(3 – 4): 483 – 490.
- Easterlin, R. A. , Morgan, R. , Switek, M. & Wang, F. (2012) . From the Cover: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 –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9775 – 9780.
- Sjöberg, O. (2010) . Social Insurance as a Collective Resource: Unemployment Benefits, Job Insecurity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88(3): 1281 – 1304.
- Tao, H. L. & Chiu, S. Y. (2010) .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Income and Absolute Income on Happi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1): 164 – 174
- Tideman, S. , Frijters, P. & Shields, M. A. (2008) .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95 – 144.

- Tella, R. D. , Macculloch, R. J. & Oswald, A. J. (2003) .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85(4) :809 – 827.
- Veenhoven, R. (1991) .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 :1 – 34.
- Veenhoven, R. (2000) . Well – 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evel Not Higher, 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1) :91 – 125.
- Wilkinson, R. G. & Pickett, K. E. (2009) .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Dysfun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1) :493 – 511.
- Zhao, W. (2012) . Economic Inequality, Status Percep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30(4) :433 – 450.

责任编辑: 岳经纶

约请组建专栏暨 2019 年征稿启事

本刊自创刊以来, 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学科与实践领域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 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色之一, 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 本刊诚挚邀请在公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 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更好。

有组建专栏意向的学术同仁, 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请提交拟组建专栏的初步计划, 专栏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专栏主题、文章篇数、初定的题目、参与的作者与基本信息和交稿日期。

另外, 本刊也非常乐意与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 通过组织学术会议、论坛等方式, 推动学科发展, 将杂志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输出的重要平台。

2019 年本刊较为关注的议题有: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与新方法、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科技体制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市场准入与监管、金融监管、商事制度改革、现代预算与财政制度改革与建设、健康中国、干部队伍建设与考核、行政伦理、绿色监管、智慧城市研究、地方治理创新、事业单位改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发展与公共管理、重大政策评估、工作 – 生活平衡、儿童福利、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智库研究, 等等。

欢迎各位学者能就以上议题或者其他重要议题为本刊组建专栏或赐稿!

Attribution model co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 path choice of disruptive Incidents in Medical Disputes—Multiple 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 YingweiWang

Abstract Medical disput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cross the country, which is a major constrai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medical order. At present,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integrated study of the inductive cause of severe medical disputes. This study took the disruptive incidents in G province involving medical disputes that occurred from 2013 to 2017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structed an attribution model of the medical disput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multiple case study metho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psychological preferences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the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regarding medical disputes we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increase medical disputes; (2)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which are the external thrust to induce medical trouble, have not been eliminat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form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and the distorted incentives of the medical services supplier caused b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marketization have aggravated the improper behaviors of doctor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cessive patient's rights safeguards,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treatment of the government dispute settlement agencies. (3) The types and quality of resources owned by doctors and patients determine their choices of tools in medical incidents. The patients not only their individual potential energy resources, but also those potential energy resources from relatives, geography, media, and others, so they have more choices for confrontation. While being passive, doctors have little choice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position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4) The style of hospital leader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lu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Rigid leadership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patients to respond forcefully, while flexible leadership has more advantages of weakening conflicts and cris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such as building a "doctor - patient - government" tripartite trust mechanism,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obstruc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use of auxiliary policy tool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 Attribution Model; Grounded Theory; Policy Tools.

● ARTICLES

Can Social Insurance Make Us Happier? —As Mediated by Self-identified Stratum and Moderated by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 Zhiyang H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ome - Happiness" puzzle has attracted the research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well – being of wages and bonuses. Scholars rarely discus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surance (the seco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happin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y of social insurance (SI)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eory (SWB) , Self – identified Stratum (SIS) , an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theory (PSPP)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 and SWB b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IS and PSPP. The study found that SI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ublic’ s SWB: those who have old – age insurance are happier than those who don’ t, those who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re happier than those who don’ t. In addition, SIS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 and SWB, and PSPP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S and SWB. This study’ s conclusions help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I and SWB and provide valuab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ocial insurance, improve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enhanc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improve public subjective well – being.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elf – Identified Stratum;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Prone to Tradition or Modernity: Gender Ideology and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 Zi Yan

Abstract Using individual – level data from the 2012 wave of CGSS, JGSS, and KGSS data, this paper teste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East Asia by highlighting the existence of conflicting gender ideology. This sheds some light on how families think about ca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gender and family norms and the shifting of elder car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rivate to the public sphere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Binary Logistic estim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divergent, gender ide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on adult children’ s attitudes toward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nd, gender ideology has a direct effect on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n’ t changed East Asia’ s filial piety tradition. Instea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the impetus for the continuity of family support in East Asia.

Key Word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Gender Ideology; 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y;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